

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及国家政策取向*

梁益坚 王锦

内容提要 二战后，世界人口分布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许多国家已经进入或将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是 21 世纪世界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地区，人口红利的潜力巨大，但基于该地区死亡率下降、生育率长期居高不下情势，人口转变进程缓慢，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时间明显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将于 2065 年左右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并将持续到 2100 年以后，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拥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也是世界上在窗口期拥有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但该地区充分兑现人口红利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和挑战，需要各国尽早行动起来，把应对人口问题作为政府的优先事项，避免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债，并陷入人口爆炸、青年大量失业、国家局势动荡、生态环境恶化以及未富先老的艰难处境。

关键词 人口问题 人口转变 人口红利 撒哈拉以南非洲

作者简介 梁益坚，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昆明 650091）；王锦，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硕士生（昆明 650091）。

二战后，世界人口数量增加了近 3 倍（从 1950 年的 25.4 亿增加到 2015 年的 73.8 亿），但新增人口的分布十分不均衡。亚洲、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数量分别新增 30 亿、9.7 亿和 4.6 亿，而欧洲、北美和大洋洲仅分别新增 1.9 亿、1.8 亿和 0.3 亿。总体而言，发达国家长期保持较低的生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非洲新型工业化趋势及中非产业战略对接研究”（15BGJ038）的成果之一。感谢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袁帆老师对本文写作给予的帮助，感谢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非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林泉喜老师提供的法语帮助。

率，中国、俄罗斯等国生育率也在大幅下降，其人口转变进程趋于完成，这些国家已经进入或将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生育率也已经大幅下降，其人口总数未来将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未来世界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地区，其生育率长期居高不下，人口转变进程才刚刚开始，其人口数量从1950年的1.8亿增长到2015年的9.7亿，并预计在2050年再翻一番，达到21.7亿。^① 非洲也将迎来人口红利的窗口期。2015~2100年，预计非洲人口增长占世界人口增长总量的86%。并且，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和抚养比的缓慢下降，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的投资并采取扩大青年机会的政策，那么它们的人口红利总量可能是巨大的：每年至少有50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且这一趋势将持续30年左右。^② 非洲巨大的人口红利潜力不但能为自身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因此，如何将这一潜在机遇变为真正的发展引擎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人口红利理论产生于对东亚新兴经济体不同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人口红利的概念最先由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威廉姆森（Jeffrey G. Williamson）在1998年时提出，他们把人口结构变量引入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实证研究中，认为年轻的人口结构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有巨大的贡献。^③ 基于此，布鲁姆等人在2002年将人口红利定义为由于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增加所产生的一个“附加生产力”。^④ 但这带来的仅仅是一种增长潜力，其实现严重依赖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因素。此后，布鲁姆和坎宁（David Canning）等学者在2002年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窗口期。同时也指出，拥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劳动、教育和人口等相

① 参见“联合国人口司数据库”（<https://esa.un.org/unpd/wpp>）。为了保持数据来源的统一性，本文所使用的相关人口数据皆来源于该数据库。

② UNFPA,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14 – The Power of 1.8 Billion: Adolescents, You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uture*, 2014, p. 21.

③ 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2, No. 3, 1998, pp. 419–455.

④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Africa's Population: In Search of a Demographic Divide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p. 183.

关政策,充分利用人口转变过程中这一一次性的“人口红利窗口期”。^①此后,又有一些学者把人口红利拓展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指通过人口转变带来的充足劳动供给和较低抚养比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次人口红利”是指通过劳动年龄人口对未来养老的担忧带来的高储蓄率和资本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②因此,“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是短暂的,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是持续的。

目前,对于非洲人口红利的研究,国内暂无相关重要研究成果。国外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以人口红利概念创始人布鲁姆为代表的几位学者从 1998 年开始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的可能性。他们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可能收获相当大的人口红利,但是由于其在死亡率下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较高的生育率,使得该地区在短期内难以兑现人口红利^③;需要进行必要的政策干预,制定和实施计划生育方案来降低撒哈拉以南非洲生育率,通过提高人均收入来增加国民储蓄,^④如果在制定和实施有利政策的情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未来应该能够实现人口红利^⑤。其二是非盟、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发布的一些相关研究报告。2012 年非盟的研究报告论述了非洲人口的基本情况,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对收获人口红利的影响,并认为有 5 个国家在未来 30 年内有望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批兑现人口红利的国家,强调各国应该在关键领域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⑥2013 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盟的研究报告从人口红利理论出发,对非

① See David E. Bloom, 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AND Corporation, 2002.

② 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Genus*, Vol. 62, No. 2, 2006, pp. 11 – 35.

③ 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D. Sachs, “Geography, Demograph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2, 1998, pp. 207 – 295; David E. Bloom, 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 op. cit., pp. 61 – 66; David E. Bloom and Jocelyn Finlay,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Vol. 4, No. 1, 2009, pp. 45 – 64.

④ David E. Bloom, S. Humair, L. Rosenberg, J. P. Sevilla and J. Trussell, “A Demographic Dividend for Sub – Saharan Africa: Source, Magnitude, and Realization”,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 42, No. 4, 2013, pp. 551 – 574.

⑤ David E. Bloom, David Canning, G. Fink and J. Finlay, *Realizi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Africa any Different*, Harvard Program on the Global Demography of Aging, Working Paper, 2007, pp. 1 – 21.

⑥ African Union, *State of the African Population Report 2012: Harnessi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or Africa’s Socio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2.

洲国家生育率的情况进行了分类研究，论述了非洲实现人口红利所需的人口条件和现实问题，认为非洲需要加大对青年的投入，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通过短期和长期政策为兑现人口红利创造机会。^① 2014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非洲人口红利的潜力巨大，将为非洲未来经济增长和减贫工作带来重要机遇，如果能创造足够就业岗位和提高储蓄投资，将有可能兑现人口红利，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上取得较大成绩。^② 其三是一些专题类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从宗教文化背景的角度阐释了为何非洲人喜欢较大的家庭规模，认为虽然女童入学率和妇女避孕需求有所增加，但非洲国家在传统宗教文化影响下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十分有限。^③ 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发展情况分析非洲国家实现人口红利面临的掣肘因素。他们认为，仅从人口结构来看，南非已经实现了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城市建设和硬件设施也有所改善，但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影响使黑人并未获得平等的医疗、教育以及就业条件，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对南非人口红利的兑现造成负面影响；^④ 现有的相关预测对非洲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过于乐观，并且低估了降低青年人口死亡率对实现人口红利的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相比，人口红利更需要降低抚养比，因为即使生育率下降，若不降低青年人口的死亡率，抚养负担依然不会下降，低储蓄率和投资不足的状况将不会得到改善^⑤；就目前非洲的情况而言，人口增加意味着贫困的增加，非洲建设所急需的高技术人才更倾向于进入发达国家就业和生活，如果政府不立即采取措施，这一状况将会持续恶化。^⑥ 另外，2017年出版的文集《非洲人口：寻找人口红利》反映了一些非洲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该书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进行了

① UNECA, "Creating and Capitalizing o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or Africa", 2013, <http://www.docin.com/p-1931335037.html>, 2018-01-13.

② World Bank, *How Significant is Africa's Demographic Dividend for Its Future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134, 2014.

③ John C. Caldwell and Pat Caldwell,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High Fertil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3, No. 3, 1987, pp. 409-437.

④ Monde Makiwane and Stella Kwizera, "Youth and Well-Being: A South African Case Stud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91, No. 2, 2009, pp. 223-242; Morné J. Oosthuizen, "Bonus or Mirage? South Africa's Demographic Dividen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Vol. 5, 2015, pp. 14-22.

⑤ Robert Eastwood and Michael Lipt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How Big Will the Economic Dividend be?", *Population Studies*, Vol. 65, No. 1, 2011, pp. 1-21.

⑥ Osman Sankoh, "Africa's Demographic Future: Why Africa Should Take the Lead", *Lancet Global Health*, Vol. 4, 2016, p. 522.

国别和区域研究，并从医疗、教育、政治经济政策、资源环境、婚姻、移民及城市化等角度分析了兑现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挑战。^①

综上，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演绎、趋势研判和专题案例研究等方面，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的细致分析不够，缺乏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变动态势等关键指标的数据分析和比较研究，以及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基本时间定位和区域国别的对比分析。基于此，本文针对上述研究薄弱点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大致确定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窗口期的时间、规模和特点，在此基础上论述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的现实困境并提出政策选择，以期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红利有初步认识。^②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窗口期

人口转变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基础。人口转变一般分为 3 个阶段：高死亡率与高生育率并存阶段；死亡率下降但生育率仍维持较高水平阶段；死亡率与生育率同时下降阶段。在人口实现从“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到“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转变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人口负担较轻的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态势，这一时期即被视为“人口红利窗口期”。从 20 世纪开始，世界各个地区相继开始死亡率和生育率由高到低的人口转变过程，许多国家利用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最晚开始人口转变的地区，随着其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逐渐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必将迎来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态势

根据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态势和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

二战后，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卫生基础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技术的进步，该地区的死亡率下降明显，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预期寿命

①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 op. cit. , pp. 11 - 501.

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包括北非地区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北非国家实行了较为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后来没有受到艾滋病的影响，其人口转变进程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基本同步，因而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较大差异。

等相关情况都有较大幅度改善，但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婴儿死亡率下降较为明显，从1950~1955年的185‰下降到2010~2015年的62‰，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2‰和35‰，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59‰和5‰）。其中，2010~2015年婴儿死亡率居高位的非洲国家分别是塞拉利昂、中非共和国、乍得和几内亚比绍等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只有佛得角、毛里求斯和塞舌尔三国。撒哈拉以南非洲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也较为明显，从1950~1955年的310‰下降到2010~2015年的95‰，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15‰和48‰），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77‰和6‰）。其中，2010~2015年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分别是中非共和国、乍得、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索马里和马里等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有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佛得角、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六国。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预期平均寿命在过去几十年显著增加，从1950~1955年的36岁增加到2010~2015年的58岁。就地区而言，中西非地区以上几项指标处于垫底的位置，特别是塞拉利昂、中非共和国、乍得、几内亚比绍和科特迪瓦等国。进入21世纪以来，南部非洲国家受艾滋病感染率较高的影响，人均预期平均寿命快速下降，2005年在艾滋病“抗反转录病毒治疗”被广泛采用之后情况有所好转，预期平均寿命开始回升。

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除了岛屿国家和南部非洲国家以外，东非、西非和中部非洲国家都处于较高水平，但也正在缓慢下降。^①目前，该地区国家正处于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根据生育率的高低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人口转变非常缓慢的国家（生育子女数量高于6人），包括尼日尔、索马里、刚果（金）、马里和乍得5个国家。这些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城市化水平不高，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度不够。第二类是人口转变缓慢的国家（生育子女数在5~6人之间），包括布隆迪、安哥拉、乌干达、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冈比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贝宁、赞比亚、南苏丹、科特迪瓦、几内亚、中非共和国和塞内加尔15个国家，它们大多属最不发达国家。第三类是正在进行人口转变的国家（生育子女数在3~4人之间），包括赤道几内亚、喀麦隆、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马拉维、刚果（布）、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多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埃塞俄比亚、科摩罗、厄立

^① 一般来讲，如果生育率低于2.1，人口增长就会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特里亚、马达加斯加、卢旺达、加纳、肯尼亚、津巴布韦、加蓬、纳米比亚、斯威士兰、莱索托和吉布提 23 个国家，其中大多数（18 个）属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沿海国家。第四类是人口转变基本完成的国家（生育子女数少于 3 人）分别是博茨瓦纳、南非、佛得角、塞舌尔和毛里求斯。这些国家的经济较为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生育率下降的较早。目前，全球生育率高于 5 人的 21 个国家中，除了阿富汗和东帝汶以外，其余都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间比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晚了 20 多年，而且下降的速度较为缓慢，区域和人群分布上也不太均衡，其中城市居民和受教育人群的生育率下降较为明显。

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必然会使人口年龄结构由金字塔形变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这一时期劳动力增加及投资储蓄增长，妇女就业机会和人力投资也相应上升，从而整体上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即人口经济学家称作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人口年龄结构越来越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国家稳定、政府治理、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有重大影响。在理论上，人口年龄结构可以分为四种：非常年轻的年龄结构、年轻的年龄结构、转型中的年龄结构和成熟的年龄结构。研究表明，非常年轻和年轻的年龄结构对国家稳定 and 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破坏性。据研究统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属于非常年轻年龄结构的国家爆发内部冲突的概率是成熟年龄结构国家的 3 倍。而处于转型中年龄结构的国家是具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只要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政策，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兑现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而那些成熟年龄结构的国家，往往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但政治局势、经济环境总体较为稳定。^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缓慢发生变化。撒哈拉以南非洲生育率的峰值是 1975 ~ 1980 年度的 6.8 人，随后在 1985 年 15 岁以下人口比重达到峰值的 45.5%，之后二者都进入缓慢下降阶段。因此，1950 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年龄结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1950 ~ 1985 年属年龄结构上升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 15 岁以下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所占比重也不断增加，从 1950 年的 7 500 万人增长到 1985 年的 1.95 亿人，所占比例由 41.7% 增加到 45.5%。其二，1985 年之后进入年龄结构缓慢下降阶段。在

^① Elizabeth Leahy et al,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Why Age Structure Matters to a Safer, More Equitable World*, 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 2011, p. 10.

这一阶段，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 15 岁以下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长（2015 年为 4.17 亿人、2050 年预计为 7.23 亿人、2100 年预计为 8.8 亿人），但所占比重开始缓慢下降（2015 年为 43.1%、2050 年预计为 33.4%、2100 年预计为 22%），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不断增加。我们通过图 1 可以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 2050 年、2100 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图与 1960 年、2015 年的相比已有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都不断增加，15 岁以下的人口比重逐渐降低，65 岁以上的人口比重逐渐增加，人口红利窗口期逐步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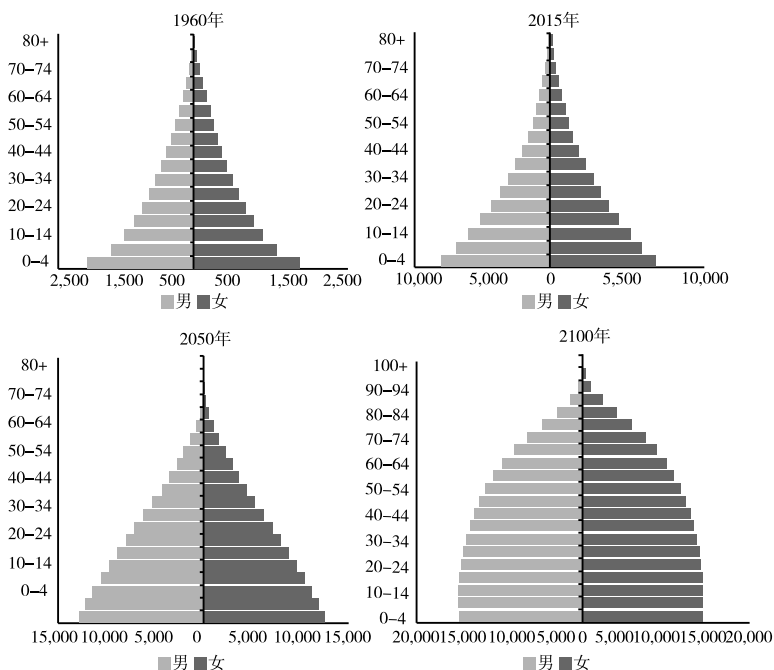


图 1 1960 年、2015 年、2050 年、210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年龄结构图（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数据（<https://esa.un.org/unpd/wpp>）自制。

根据长期预测数据^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数量在 2050 年将达到 21.7

^① 本文使用的是“中等变量”（Medium Variant）情况下的预测数据。“高等变量”（High Variant）情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数量在 2050 年为 23.9 亿，2100 年为 55.6 亿；“低等变量”（Low Variant）情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数量在 2050 年为 19.6 亿，2100 年为 28 亿。研究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保持较高生育率或实现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可能性较小，所以本文采用“中等变量”（Medium Variant）情况下的预测数据。

亿,到2100年将达到40亿。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2015~2100年间人口快速增加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将不断上升,从2015年的13.1%将上升到2050年的22.2%和2100年的35.8%;而亚洲地区所占的比例将大幅下降,从2015年的59.9%下降到2050年的53.8%和2100年的42.7%;欧洲地区也将不断下降,从2015年的10%下降到2050年的7.3%和2100年的5.8%。2015年到2100年间,东部、中部和西部非洲地区将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人口数量将增加约4倍,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提高约3倍;而南部非洲地区受艾滋病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数量增加46%,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基本保持不变。其中,尼日尔的人口数量将增长近10倍,从2015年的1989万增加到2100年的1.9亿;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人口数量增长5倍以上的国家还有赞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布隆迪、乌干达和刚果(金)。2100年,预计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主要有:尼日利亚(7.9亿)、刚果(金)(3.8亿)、坦桑尼亚(3亿)、埃塞俄比亚(2.5亿)、乌干达(2.1亿)、尼日尔(1.9亿)、安哥拉(1.7亿)、肯尼亚(1.4亿)、苏丹(1.38亿)、莫桑比克(1.35亿)、科特迪瓦(1亿)。

(二) 撒哈拉以南非洲抚养比的变动态势

抚养比是考察人口红利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说来,抚养比越大,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即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重。按照国际标准,非劳动年龄人口是指0~14岁少儿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两部分人口的总和。抚养比高的国家,大量资源用于抚养非劳动年龄人口,而抚养比低的国家则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医疗、教育、投资和技术研发等领域。研究表明,东亚地区在1965~1990年期间抚养比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明显快于人口的整体增速,在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努力下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①

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正处于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到,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的抚养比突出体现为以下特点:其一,抚养比的峰值时间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差不多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

^① 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op. cit., pp. 419-455; David E. Bloom, David Canning and Pia N. Malaney,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6, 2000, pp. 257-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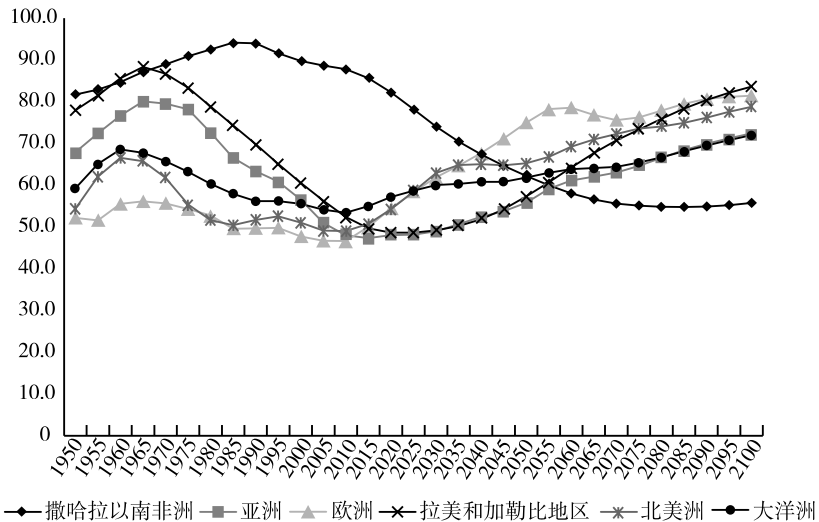


图2 1950~2100年世界各地抚养比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数据 (<https://esa.un.org/unpd/wpp>) 自制。

的抚养比在1985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缓慢下降，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峰值大多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其二，抚养比的峰值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抚养比的峰值为1985年的94.1%，而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为1965年的88.3%，亚洲为1965年的80.1%，大洋洲为1960年的68.6%，北美为1960年的66.5%，欧洲为1965年的56.1%。其三，抚养比从峰值到谷底的时间远多于世界其他地区。世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抚养比在21世纪前十年到达谷底，随后开始缓慢上升并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下降的时间和速度都明显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在1985年出现拐点，但由于其生育率下降速度非常缓慢，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预计将在21世纪80年代才能到达谷底。从抚养比的峰值到谷底，撒哈拉以南非洲预计将用约100年的时间，而世界其他地区用了50~55年的时间。其四，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错峰转变”。图2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唯一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变化情况明显不同的地区。当世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在2010年前后开始上升的时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还在不断下降，并在2040年开始低于欧洲，到2060年时已经低于世界所有其他地区，并将保持到2100年以后。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导致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变化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但可能因此“因祸得福”，实现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错峰转变”。当世界其他地区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较低的抚养比和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地区。这也预示着撒哈拉以南非洲是 2060 年以后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

（三）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窗口期及特点

人口红利窗口期意味着一国的人口结构态势进入“二低一高”阶段，即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对于人口红利窗口期的研判，学者依国情差异提出了不同的计算标准。联合国人口司在 2004 年的研究报告《到 2300 年的世界人口》中提出，当人口平均年龄低于 40 岁时，人口红利窗口期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5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低于 30%、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 15%，^① 并以此将人口转变划分为 3 个时期：幼年期（15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高于 30%）、青年期（15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低于 30% 和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 15%）、老年期（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高于 15%），其中青年期就是人口红利窗口期。^② 就非洲研究而言，喀麦隆学者贝宁吉赛（Gervais Beninguisse）认为，抚养比低于 80% 就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受抚养人比例低于 45%，15~64 岁人口至少为 55%。^③ 美国学者图尔伯德（Vincent Turbat）结合西非地区的情况，认为许多青年在 28 岁之前一直是被抚养人口，在 63 岁之后已开始成为被抚养人口，因此将计算抚养比的年龄修改为 28 岁以下和 63 岁及以上人口。^④ 实际上，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5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低于 30% 和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 15%）比仅仅满足抚养比这一个条件能更准确地反映该地区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和所处阶段，故本文采用联合国人口红利窗口期的计算标准。

世界主要地区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并不同步，有明显的先后顺序。欧洲是最先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也是最先结束的地区。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2000 年左右结束。北美、大洋洲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在

①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to 2300*, 2004, p. 2.

② United Nations, *op. cit.*, pp. 70-71.

③ Gervais Beninguisse and Liliane Manitchoko, "Countries with Slow and Irregular Fertility Transitions", in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op. cit.*, p. 141.

④ Vincent Turbat,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Potential Surplus Generated by a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op. cit.*, pp. 182-183.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21 世纪 20 年代左右结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二战后都诞生了“婴儿潮一代”，这既得益于战后经济恢复，也得益于科技进步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随着他们进入老年期，北美和大洋洲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在 2015 年前后结束。东亚地区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等在二战后也都迎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凭借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经济奇迹”。亚洲（东亚除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大致集中在 21 世纪 10 年代至四五十年代。通过图 2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抚养比是世界上最低的。其中，东南亚、加勒比和南美洲地区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稍早一些，中亚、南亚、西亚和中美洲地区要稍晚一些。相比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最晚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

根据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先后顺序（见表 1），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最早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2025 年前进入），包括毛里求斯、塞舌尔、南非、吉布提、佛得角、博茨瓦纳六国。这些国家都是 1950 年以后生育率下降较快的国家，其中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南非目前已经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毛里求斯在 1990 年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入最早的国家，该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该地区尤为突出，但由于其生育率已经低于替代水平，未来的总人口数将逐渐下降。南非是 6 个国家中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但遗憾的是，艾滋病的灾难性影响使该国青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南非将无法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①

第二类是较早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2040 ~ 2060 年进入），包括莱索托、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加蓬、卢旺达、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厄立特里亚、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加纳、科摩罗、中非共和国、马拉维、马达加斯加、南苏丹、喀麦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利比里亚、冈比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多哥 25 国。其中，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喀麦隆、加纳、马拉维等都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较多的国家。就世界范围来看，在 2040 ~ 2060 年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除阿富汗、也门、巴勒斯坦、东帝汶和伊拉克之外，其余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① Tom A. Moultrie, “A Case of An Almost Complet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outh Africa”, in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op. cit.*, pp. 91 - 96.

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红利优势在这一时期开始凸显。

第三类是较晚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2060 ~ 2070 年进入），包括刚果（金）、塞内加尔、莫桑比克、乌干达、乍得、刚果（布）、贝宁、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利亚十国。其中，尼日利亚、刚果（金）、乌干达三国都是劳动年龄人口数超过 1 亿的国家，尼日利亚在 2070 年和 2100 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将分别达到 3.7 亿和 5.2 亿。就世界范围来看，在 2060 年之后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将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第四类是最晚（2070 年以后进入）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包括布隆迪、坦桑尼亚、科特迪瓦、赞比亚、索马里、安哥拉和尼日尔七国，生育率下降极其缓慢是主因。其中，坦桑尼亚、尼日尔、安哥拉三国是劳动年龄人口数超过 1 亿的国家，坦桑尼亚在 2075 年和 2100 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将分别达到 1.4 亿和 1.9 亿。

表 1 仅显示到 2100 年的数据，但这并不表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在 2100 年结束。根据 2100 年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低于 15% 的计算标准，在 2100 年之后还将有一大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依然处于窗口期，包括尼日尔、科特迪瓦、索马里、安哥拉、布隆迪、尼日利亚、贝宁、乍得、多哥、毛里塔尼亚、马里、赞比亚、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南苏丹、坦桑尼亚、几内亚比绍、乌干达、塞内加尔、科摩罗、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和刚果（布）23 国。

表 1 1950 ~ 210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窗口期和 15 ~ 64 岁人口数量

地区与国家	开始时间 (年)	结束时间 (年)	窗口时间 (年)	开始与结束时 15 ~ 64 岁 人口总数 (万人)
撒哈拉以南非洲	2065	2100 +	35 +	177 346 ~ 256 948
毛里求斯	1990	2025	35	70 ~ 89
塞舌尔	2000	2030	30	5 ~ 6
吉布提	2020	2065	45	66 ~ 90
卢旺达	2045	2075	30	1 336 ~ 1 764
埃塞俄比亚	2045	2075	30	11 832 ~ 15 477
津巴布韦	2045	2080	35	1 810 ~ 2 509
肯尼亚	2050	2080	30	6 142 ~ 8 380
厄立特里亚	2050	2085	35	617 ~ 881

科摩罗	2055	2100 +	45 +	101 ~ 142
马拉维	2060	2090	30	3 180 ~ 4 538
马达加斯加	2060	2095	35	4 045 ~ 6 021
南苏丹	2060	2100 +	40 +	1 907 ~ 2 809
莫桑比克	2070	2100 +	30 +	6 165 ~ 8 632
乌干达	2070	2100 +	30 +	9 794 ~ 13 775
布隆迪	2075	2100 +	25 +	2 582 ~ 3 527
坦桑尼亚	2075	2100 +	25 +	13 880 ~ 19 126
赞比亚	2080	2100 +	20 +	4 510 ~ 5 917
索马里	2080	2100 +	20 +	4 013 ~ 5 178
加蓬	1950	1955	5	30
	2040	2075	35	197 ~ 289
赤道几内亚	2050	2090	40	190 ~ 291
中非共和国	2055	2095	40	620 ~ 892
喀麦隆	2060	2100	40	3 739 ~ 5 819
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	2060	2100	40	28 ~ 39
刚果（金）	2065	2100	35	16 670 ~ 24 581
乍得	2070	2100 +	30 +	3 016 ~ 4 062
刚果（布）	2070	2100 +	30 +	1 031 ~ 1 483
安哥拉	2080	2100 +	20 +	8 508 ~ 11 078
佛得角	2020	2055	35	38 ~ 50
塞拉利昂	2050	2100 +	50 +	856 ~ 1104
加纳	2050	2100	50	3 286 ~ 4 980
几内亚	2060	2095	35	2 036 ~ 3 009
利比里亚	2060	2095	35	738 ~ 1 099
冈比亚	2060	2100 +	40 +	348 ~ 478
几内亚比绍	2060	2100 +	40 +	268 ~ 385
毛里塔尼亚	2060	2100 +	40 +	668 ~ 1 012
多哥	2060	2100 +	40 +	1 138 ~ 1 668
塞内加尔	2065	2100 +	35 +	2 776 ~ 4 091
贝宁	2070	2100 +	30 +	2 100 ~ 2 884

布基纳法索	2070	2100 +	30 +	3 899 ~ 5 331
马里	2070	2100 +	30 +	4 049 ~ 5 495
尼日利亚	2070	2100 +	30 +	37 171 ~ 52 100
科特迪瓦	2075	2100 +	25 +	4 970 ~ 6 743
尼日尔	2090	2100 +	10 +	10 755 ~ 12 496
南非	2015	2065	50	3 626 ~ 5 044
博茨瓦纳	2025	2060	35	172 ~ 238
莱索托	2040	2080	40	194 ~ 251
纳米比亚	2040	2080	40	247 ~ 360
斯威士兰	2040	2080	40	126 ~ 160

说明：加蓬在 1950 ~ 1955 年 2040 ~ 2075 年两个时间段出现了满足人口红利窗口期两个条件（15 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低于 30% 和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 1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数据（<https://esa.un.org/unpd/wpp>）自制。

总体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其一，各次区域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时间点不均衡。其中，南部非洲地区较早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其原因在于该地区主要受到艾滋病造成青年高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快速下降的影响。东部非洲稍微早于中部、西部非洲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届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是非常巨大的。其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在窗口期拥有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超过了东亚、南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其三，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拥有窗口时间较长的地区，窗口时间大约为 40 ~ 45 年，超过了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兑现人口红利的现实困境

人口红利窗口期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它只是提供了机会窗口，即发展的机遇，它本身并不是红利，唯有充分利用了机会窗口，才可能兑现人口红利带来的红利效应。事实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人口红利与机会窗口对接方面还面临诸多困境。

（一）制约因素

兑现人口红利需要在医疗、卫生、生育、教育和经济政策等领域创造适

合的条件。但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国家显然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主要体现在：

第一，生育率下降缓慢。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条件之一是生育率的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虽然开始下降，但总体下降非常缓慢。20世纪70年代，南非、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加纳等少数几个国家启动了计划生育方案，但只有南非在2010~2015年度的生育率降到了2.6，其他三国降到4左右。^①近年来，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两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计划生育行动，两国的生育率也实现了快速下降，分别从1995~2000年度的5.9和6.8下降到2010~2015年度的4.2和4.6。然而，尼日尔、刚果（金）、安哥拉和乌干达等一些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国家，生育率刚刚开始下降就随即处于停滞状态。总的来说，早生多生、拥有较大家庭规模的传统观念不仅制约了生育率的下降，也限制了女孩受教育的权利，使其社会地位较低。避孕药具的供给不足也制约了生育率的下降速度。研究表明，非洲是世界上使用避孕药具使用率最低的地区，只有22%的已婚妇女使用了避孕药具，另外有25%育龄妇女表示希望推迟或避免怀孕，但由于避孕药具的缺乏而没有满足避孕的需求。^②

第二，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匮乏。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公共财政收入有限，造成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匮乏。其一，在医疗卫生领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2014年人均医疗支出为98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的1059美元）。由于较高的生育率，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医疗支出约有一半用于孕妇和婴幼儿特殊群体。这主要是由于许多高风险怀孕现象（早孕或高龄产妇、怀孕太频繁等）所导致的结果，因而孕妇和新生儿需要额外的护理，以减少目前非常高的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与高危妊娠相关的发育迟缓儿童的比例。而这些发育迟缓的儿童在学校学习困难程度较大，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弱，对家庭和国家都会造成长期影响。^③1990年至2013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发育迟缓的儿童数量增加了约1/3。2015年，全球体重不足的儿童有1/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④其二，在教

①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 op. cit. , p. 24.

② UNECA, op. cit. , pp. 21 - 22.

③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 op. cit. , p. 24.

④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2015》，2015年，第22页，<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library/mdg/mdg-report-2015>，2017-12-27。

育领域，兑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目前，非洲的小学教育虽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中学、大学教育依然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 2014 年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入学率（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分别为 77.9%、42.7% 和 8.6%（低于世界平均的 89.5%、76.4% 和 35%）。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中等和高等教育资源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的需要。尽管许多非洲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但该地区仍有约 3 500 万儿童根本就沒上过学，其中女孩的受教育权利就更难得到有效保障。^① 还有一些地区战乱频发使得教育公共资源异常匮乏，这不仅让大多数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增加了他们加入恐怖主义组织的风险。

（二）面临的挑战

对非洲而言，不断增长的青年人口是一笔“财富”，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兑现人口红利方面，除了传统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因素，还需要应对以下挑战。

第一，创造就业的能力能否满足大量劳动力的市场需求。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和充满动荡的新时期，从全球范围来看，就业增长的速度已赶不上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全球人口就业率从 1991 年的 62% 下降到了 2015 年的 60%。虽然近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就业形势略有好转，从 1991 年的 63% 上升到 2015 年的 65%，但持续高水平的不充分就业和非正式就业以及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抵消了生计改善的努力。^② 尽管人口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但未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快速增长，2015~210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劳动年龄人口将增长 4.9 倍，从 5.2 亿人增加到 25.7 亿人。而大多数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单一造成创造就业的能力不足，如果不能实现以资源密集型产业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转型，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将会产生巨大的失业压力。大量失业人口将给社会带来极大风险，他们对经济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怨恨”很有可能转化为政治暴力，进而引发武装冲突。如果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充分利用好大量青年劳动力的机遇期推动社会经济实现较快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当这些青年人普遍进入老年阶段后产生的老

^① UNECA, op. cit., p. 24.

^②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2015》，2015 年，第 17 页，<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library/mdg/mdg-report-2015>, 2017-12-27。

龄化问题和已经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则会使整个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第二，城市化的进程能否跟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城市化不同于发达经济体。早期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工业发展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农村人口来到城市，使城市规模逐渐扩大。事实上，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没有造成城市人口突然膨胀和城市资源压力陡然增加。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城市化并不是由产业结构变化造成的，只是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结果，且流动人群以青年人为主，这样的人口流动在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同时也加重了城市发展的压力。其主要致因如下：其一是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分配不均。基于殖民历史，非洲国家的许多金融和社会保障机构集中在城市，城市的学校和医疗服务均好于农村。即使这些国家获得独立之后，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城市仍然被视为“特权岛”（Islands of Privilege）。^① 其二是环境变迁和自然灾害因素。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和发生自然灾害时，国家缺乏资金和有效的行政干预，致使大量人口离开家乡，寻找资源相对丰富且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其中的一部分人口流入城市。其三是国内暴力冲突导致的人口迁徙。人口增长引起的耕地、淡水、森林和渔业等资源的短缺会引发族群冲突和暴力蔓延，致使人口迁往邻近国家或大量涌入城市。^②

目前，非洲地区正在迅速城市化。201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已成为世界上城市化最快的地区，城市人口比例预计从2014年的37%上升到2050年的55%。^③ 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500万人口的城市将达到35个，其中金沙萨和拉各斯的人口预计将超过3000万人。^④ 然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并不是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而是人们需要城市为其提供比农村更好的生存资源，这样的流动导致城市的供给和需求失去平衡，城市的医疗卫生、教育资源和住房条件难以承载这种人口快速流入带来的压力，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贫

^① P. Bocquier,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An Alternative To the UN Model of Projection Compatible With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Theory”,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 12, No. 9, 2005, pp. 198–233; B. Cohen, “Urban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And a Caution Regarding Existing Forecast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2, 2004, pp. 23–51.

^② See Thomas Homer-Dixon and Jessica Blitt eds., *Ecoviolence: Links among Environment, Population and Security*,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③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op. cit.*, p. 321.

^④ Jean-Pierre Guengant and John May, “African Demography the Divided is Delayed”, *The Economist*, March 8, 2014, pp. 48–49.

民窟，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堪重负，失业率和犯罪率明显上升，城市管理也更加混乱，这些都在考验着非洲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自然生态环境能否承载持续扩大的人口经济规模。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从 1950 年的 1.8 亿增加到 2015 年的 9.7 亿，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使得自然生态环境变得非常脆弱；人均耕地面积在 1961 至 2015 年间下降了 63%，造成土地过度开垦，并迫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森林覆盖面积由 1990 年的 29.5% 下降到 2015 年的 25.7%，土地荒漠化和森林砍伐加剧了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冲突。在乍得湖地区，由于基础设施缺乏和不恰当的灌溉方式造成湖区大面积萎缩，加剧了尼日利亚北部、喀麦隆和乍得的水资源危机。^① 然而，即使是在目前自然环境已经非常脆弱的情况下，按日均生活费不足 1.9 美元国际新贫困线标准，2015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人口有 3.47 亿，贫困发生率为 35.2%。^② 2016 年，该地区营养不良人口 2.24 亿，占总人口的 22.7%。^③ 到 210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预计增至 40 亿，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必然将极大地考验撒哈拉以南非洲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政策选择

人口红利的获得并不是自动的，而是有条件的。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潜在收益，取决于政府的执政水平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为此，非洲国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通过降低生育率步入人口红利窗口期

降低人口生育率、减小抚养比是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家庭支出、提高劳动力数量和增加储蓄与投资。而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受传统文化和小农经济影响，家庭规模较大，并且追求早生、多生。医疗卫生条件的不足、营养不良和疾病的肆意传播也使非洲家庭对儿童的存活率信心不足，在他们看来，只有多生才能维持基本的家庭生产。

① B. Mberu et al., "Internal Migration, Urbanization and Slums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op. cit., p. 320.

② AFDB, Indicators on Gender, Poverty, the Environment and Progress towar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frican Countries 2017, <http://www.afdb.org/statistics>, 2017-12-21.

③ FAO, 2017 *Africa Regional Overview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Accra, 2017, p. 6.

另外，女性的教育水平也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政府应从公共卫生、教育和女性权益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

第一，增加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需要把医疗卫生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政府、个人和外国援助等多方力量的积极作用，大幅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其一，制定并实施计划生育方案。在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和妇幼健康的宣传动员工作，向公众传达有关小规模家庭能获得更好的健康发展和经济效益的信息，并向其提供必要的避孕用品，对已经建立家庭的夫妇提供长效避孕措施来降低意外怀孕率，逐步缩小家庭规模。如果避孕需求得到满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将能够再下降一个层次。其二，扩大妇幼保健服务的覆盖范围。覆盖和满足弱势群体的妇幼保健需求，这是降低生育率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并能为人口的健康发展带来许多其他好处。相关机构将产前护理、产后护理和解决儿童营养不良问题结合起来，通过不断降低孕妇的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逐渐改变父母对家庭规模的要求，进而实现生育率的下降。其三，加大传染病防治力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虽然在过去30年有了显著的改善，但传染病防治的形势依然严峻。艾滋病的肆虐使南非的人口红利几乎已经成为“海市蜃楼”。^①目前，疟疾、结核病、艾滋病以及埃博拉等疾病的高发病率和潜在影响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兑现人口红利的长期隐患。需要政府建立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并保障持续的药物供应，控制疾病的传播和影响，进而不断提高民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

第二，增加教育领域的投入。人力资本积累是兑现人口红利的重要保障。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步，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和全球竞争力。其一，进一步提高入学率和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这需要政府制定和完善法律，以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利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小学入学率和完成率。此外，政府还需要加大对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投入，逐步提高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并通过多种手段帮助更多的青年人完成学业，这样不仅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还有助于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推迟初婚年龄。高等教育还需要适应全球经济变化的形势，在科学、工程、数学和计算机等领域培养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

^①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 op. cit. , p. 98.

其二，提高教师待遇，增加教师人数，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到 2060 年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 0~14 岁的人口比例都将高于 30%。政府需要在师资、待遇和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增加投入以适应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注重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帮助年轻人获得并提升劳动技能。政府增加教育领域的投入，不仅有助于积累人力资本和降低贫富差距，还有助于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加入恐怖主义组织的可能。

第三，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受过教育的女性是促进兑现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整体较低，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例如，政府可以通过为女童提供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鼓励家长允许女孩上学，提高女性入学率，并不断增加完成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除了提供基本的教育外，政府还可以为女性青年提供小额信贷来帮助其完成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或者自主创业。政府可以制定法律来防止早婚行为（18 岁以前），采取措施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准新娘提供资金帮助或替代解决办法，避免其因为贫困而过早结婚。受过教育的女性也更有意愿参加社会就业和拥有较小的家庭规模，并倾向于将所得收入用于家庭健康和子女教育。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女性权益，实现性别平等，避免女性社会地位固化，有助于使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话语权。

（二）通过配套政策来用好第一次人口红利

降低生育率只是兑现人口红利的第一步，政府还需要为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来使红利效应真正发挥作用。如果市场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就会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并进一步加剧社会不稳定和暴力冲突。但政府本身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绝大多数就业岗位来自市场和私营企业，政府要充分重视市场的作用。为了使潜在的人口红利真正成为带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展的经济引擎，政府需要确立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消除人口流动障碍，并改善重点地区的营商环境。

第一，制定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积极实现充分就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缺乏足够的就业岗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主要风险之一。基于此，政策需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其一，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单一，使得这些国家的财政状况极其脆弱。国际市场对非洲矿产资源的需求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但难以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矿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非

洲国家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走多元化发展之路，将资源收入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不但能增加就业、减少国际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也可以降低资源收入带来的寻租和腐败现象。其二，助力小微企业和农村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政府推行降低经营成本、改善融资环境、鼓励私营部门发展等优惠政策，助力小微企业和农村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小微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技能要求相对较低，能吸收大量劳动力，有利于吸纳女性就业，由此有效减少人口增加带来的就业压力。政府相关部门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同时，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为农民提供小额贷款等多种方式增加农村人口就业机会，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减少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向城市。农业是国家的基本产业，对农村产业的扶持不但有利于加快农村地区的发展，还有利于更好地服务非洲城市化进程。

第二，消除人口流动障碍，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灵活就业。其一，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为城市新增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互惠互利、相辅相成的。政府相关部门需提前为城市发展做好整体规划，特别是在金沙萨、拉各斯等未来的超大城市，着力解决城市贫民窟和住房短缺的问题，为城市新增人口提供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为快速城市化的地区提供结构性基础设施，消除人口流动障碍，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灵活就业，提高非洲城市竞争力。其二，保护合法的境外就业，让个人与国家均能受益。境外就业是促进国家发展和提高家庭收入的方式之一。消除境外就业的障碍，可以重新平衡派出国和目的国之间劳动力市场，加快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境外就业可以从两个方面给国家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一方面，可以减轻派出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往往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青年人也愿意前往境外就业；另一方面，境外就业人口通过汇款和投资等方式将收入返回母国，可以增加母国的外汇收入和经济活力。因此，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使这一渠道长期化、便利化，让个人与国家均能从中受益。

第三，优先改善重点地区的营商环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要想从大量青年人口中受益并兑现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其一，改善基础设施，创造安全便捷的投资环境。为进一步提高非洲国家的投资吸引力，政府应着力改善产业聚集区、经济特区等重点地区的电力供应、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制定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改变传统的经营方

式，吸引私人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给予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等优先行业的投资在税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制定法律来保障投资人的权益。其二，制定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减少关税壁垒，加快区域一体化建设。大多数非洲国家国内市场规模较小，不利于形成规模效应。这需要非洲区域与次区域组织、非洲国家间不断完善区域内的互联互通、金融合作，实行统一关税，简化海关边境管制和货物检验程序，不断增加区域内贸易总额。区域一体化不但能够实现产业合理分工、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增加就业岗位，还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紧密的贸易联系不但可以稳定市场价格，还有助于提高私营企业的竞争力。良好的市场运作机制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并降低通货膨胀，使社会经济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三）通过长期政策来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窗口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时期。人口红利窗口期带来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是短暂的，但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是持续的，而且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还需要在全面了解人口红利实现途径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的长期政策来延长人口红利效应，为青年人的衰老提前做准备，保障在老龄化阶段持续拥有“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一，加强国家制度建设，推动国家长治久安。制度的好坏在保障相关政策能长期有效执行的同时，也决定国家能否将现有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研究表明，制度建设越完善的国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越小。^① 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教育质量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国家制度建设与行政能力水平。良好的治理有利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增加生产性投资、打击贪污腐败和避免资源浪费。

第二，构建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长期来看，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人口老龄化，构建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有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非洲国家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不可避免的老龄化做好准备。对剩余储蓄的合理使用是在人口

^① H. Mehlum, K. Moene and R. Torvik,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ource Curs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6, 2006, pp. 1 - 20.

老龄化阶段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充分条件，鉴此，非洲国家可以通过相应的经济政策，拓宽老年人储蓄资金的社会化投资渠道，在实现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促进经济繁荣稳定。

结 语

人口红利的根本要义在于人的发展，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提高民众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健康和教育问题得不到较好解决，人口红利将很难实现。面对未来如此巨大的人口红利规模，基于第一次人口红利潜力不会自动兑现的现实，撒哈拉以南国家需要为之付出艰辛且持续的努力。政府需要加大对青年人的投入，让他们充分地发挥潜力，更好地融入社会，积极地参与国家发展进程。正如 20 世纪 50 年代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改变了许多国家的人口政策并最终改变了世界人口增长趋势一样，加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尽早引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高度重视，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积极制定长期政策和实施相关的配套措施和长期政策，最终促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增长朝着更有利于兑现人口红利的方向发展。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制定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更注重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忽略人口因素对经济的长远影响。在这些国家看来，众多的人口将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即使国家的生育率和抚养比很高，但凭借数量众多的劳动力依然可以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新兴经济体（但事实上，新兴经济体都是实现或基本实现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国家）。^①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就业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如果一国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大量的青年人将助力撒哈拉以南非洲复制东亚的“经济奇迹”；反之，如果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大量的失业青年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震荡源”。青年失业与地区或国家的和平、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在过去 15 年里，失业青年人数的增加以及他们的绝望情绪正在不断地破坏着非洲的和平、安全和发展进程。^② 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在拥有世界上最后一个人口红利窗口

^① Hans Groth and John F. May eds. , op. cit. , p. 30.

^② African Union, op. cit. , p. 36.

期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变为人口负债，并使其陷入人口爆炸、青年大量失业、国家局势动荡、生态环境恶化以及未富先老的艰难处境，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需要尽早行动起来，把迎接和应对人口挑战作为政府的优先事项。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olicy Orientation in Sub – Saharan Africa

Liang Yijian & Wang Jin

Abstract: After WWII, the worl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ad been experiencing structural changes. Many countries have entered or gradually enter the aged tendency of population. Sub – Saharan Africa will be the main area for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ts demographic dividend has a great potential. However, Sub – Saharan Africa lagged behi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entering the demographic window because of its slow decline in fertility and slow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Sub – Saharan Africa will enter the 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 around 2065, which will continue until 2100. It is the last region with demographic window in the world, and also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most working – age population in the window period. However,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e Sub – Saharan African demographic dividend faces many constraints and challenges. Sub – 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deal with population issues as a government priority to prevent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from becoming a demographic debt, and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explosion, massive unemployment among youth, in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n aging society before getting rich.

Key Words: Demographic Issu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Sub – Saharan Africa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